



# 故宫博物院与考古学

李 季

**内容提要** 一座建立在昔日皇家宫殿建筑与宫廷文物旧藏基础之上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在迎接其 90 华诞时建立起考古学研究机构，它对所在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究竟有何裨益？或者说，借助故宫这座特殊博物馆提供的平台，故宫考古所对中国考古事业和学科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本文在此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一般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二、故宫博物院藏品特点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三、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的方向与规划。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考古学 博物馆 文物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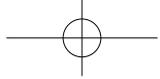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2013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研究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张忠培、郑欣淼、单霁翔三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出席了成立仪式。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近90年来第一次内设考古研究机构。该所性质由其章程表述为：故宫考古研究所是故宫博物院建立的设在故宫研究院内的学术机构，以相关考古学领域研究为学术方向，具有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资质和若干名具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人员，可以独立或者合作申报考古调查发掘项目。该所将坚持以课题为导向，以项目为核心，以规范为依循；逐步建成一所符合考古学研究规律和故宫博物院实际，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学术民主、体制开放、机制灵活、技术精湛、充满生机的新型科研机构。

一座建立在昔日皇家宫殿建筑与宫廷文物旧藏基础之上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在迎接其90华诞时建立起考古学研究机构，它对所在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究竟有何裨益？或者说，借助故宫这座特殊博物馆提供的平台，故宫考古所对中国考古事业和学科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循此思路，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如下：一、一般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二、故宫博物院藏品特点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三、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的方向与规划。

## 一 博物馆与考古学

不只是中国的博物馆、考古学同本土上千年来的收藏传统和金石学有着无法割断的渊源脉络，西方亦是如此，欧洲的王室、教会也拥有悠久的博物收藏历史。本文所讨论的是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和考古学，并不涉及19世纪前的收藏与古物研究。



经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是现代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发祥地，二者自从降世就亲如孪生，血缘密切。1807年，“保护与收藏丹麦古物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成立，尼厄鲁普(Rasmus Nyerup，又译作尼勒普，1759-1829)担任秘书长，就在同一年，他着手组建了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当时名为哥本哈根北方古物博物馆，the Museum of Northern Antiquities in Copenhagen)，随后的许多考古研究成果就是在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中产生的。1816年汤姆森(Christian J.Thomsen，1788-1865)接任了这一职务，同时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馆长<sup>1</sup>。汤姆森对博物馆藏品陈列逻辑进行了梳理，对古代工具与武器材质的演进进行了探索，并尝试把它们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组，假设各组代表了依次继承的三个时代。汤姆森1836年在《北方文物陈列指南》<sup>2</sup>(*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一书所提出的三期说，把遗物放进社会历史的框架里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其后，三期说被他的学生沃尔森(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1821-1885)应用于欧洲等地田野考古的遗迹分期实践。汤姆森的三期说不仅是考古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博物馆的藏品经过科学的分类和整理后，开始具备以学术阐释为基础的系统，并且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记忆。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1843-1921)利用对博物馆藏品的观察与研究，在《先史考古学方法论》<sup>3</sup>(*Die älteren kulturperioden im Orient und in Europa*)中提出了考古学系统的类型学，使这门新兴学科得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西方的主要博物馆从充实藏品、丰富陈列出发，多有独立的或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的考古活动，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大英博物馆从19世纪起便组织和参与考古调查发掘，除了在英国本土的考古工地之外，还活跃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各个中心——埃及、希腊、罗马和两河流域。英国人将在当地获取的重要文物运回伦敦入为馆藏的做法，至今仍备受声讨。在德皇威廉三世的资助下，柏林博物馆埃及部门的负责人列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1810-1884)于1842-1846年间，在埃及王陵谷地主持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

1863年，埃及国家博物馆由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1821-1881)创建，主要目的是防止埃及考古发掘文物的流失。马里埃特还担任过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副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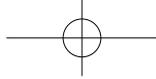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2013年执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新任馆长马尔迪内(Jean-Luc Martinez)同样是一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古代希腊文明，曾经参加过雅典法兰西学院在提洛斯岛和德尔菲的考古发掘。

这些西方博物馆开展的考古活动，不仅满足了博物馆对开拓藏品来源的需求，而且通过对已经获得的藏品的权威阐释，显著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同时还收获了相对稳定的来自王

<sup>1</sup> Rowley-Conwy, Peter, *From Genesis to Prehistory: The Archaeological Three Age System and Its Contested Reception in Denmark,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2</sup> 该书手稿出版于1836年，1846年与之同名的博物馆指南出版，作者Julius Sorterup，是汤姆森的一位助手。

<sup>3</sup> *Die älteren kulturperioden im Orient und in Europa* (1903). Stockholm, Selbstverlag des verfassers. In commission bei A. Asher & c.o, Berlin.



室、政府、社会团体的支持和财政捐助。随着时代变迁，各文明古国对本土文化遗产管理的强度显著提升，控制出土文物和标本出境的规定愈加严格。尽管今日西方的一些博物馆仍然保持了考古机构的设置，但多以学术研究为主，获取藏品的职能已经逐渐式微。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博物馆的诞生，大体以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1912年在北京国子监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和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主要脉络，文物藏品主要以宫廷与民间的传世收藏为主。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若以田野考古发掘科学方法的建立来衡量，其诞生应该是受到地质学等自然学科的影响，从时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中国学者李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到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开始的发掘，代表了当时考古发掘的最高水平和最强实力。

此外，一些地方博物馆也进行过自己的考古活动，主要是对已暴露的古代遗址墓葬的清理。例如，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曾于1921年对河北巨鹿宋城遗址、1924年对河南信阳一批汉墓、1926年对湖北枝江古墓群进行过考古工作，前二者皆发表了发掘纪略<sup>1)</sup>。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1936年发现了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成立较早的河南、山西、四川等省立博物馆也都参加过一些本省内的考古发掘和清理。

1933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议下，教育部指导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任筹备处主任，1934年由李济继任筹备处主任、郭宝钧为总干事。他们既参与了博物馆的筹建，也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考古发掘活动，如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考古发掘等。博物馆与考古两方面的工作既有区分也有重叠，在当时就被认为难以完全划分界限<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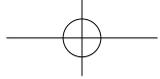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1949年以后，考古工作与博物馆工作呈现出有分有合、分分合合的态势。如在科学院系统的(后来又拆分出社会科学院)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中央政府建立的专业考古机构，后来成立的陕西、新疆等考古所也一度归属科学院(社科院)系统。此外地下文物资源较多的地方，如北京、河南、河北、山西等省市的考古工作，则居于当地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体制之下，多被称为文物工作队。再有，在一些主要博物馆，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机构内设立了考古部门，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来自北京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参与了学术研究的架构和创建。后来成为院长的马衡先生虽然是金石学家，但对考古活动一直兴趣盎然，而且于1930年主持了河北易县燕下都的考古发掘，傅振伦先生也参与了工作<sup>3)</sup>。

<sup>1)</sup> 李守义：《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概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sup>2)</sup> 《南京博物院八十年院史》，南京博物院编，2013年。

<sup>3)</sup> 沈颂金：《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傅振伦：《燕下都考古系年要录(1921-1987)》，《文物春秋》1990年第10期。



1949年后，因为当时还没有综合类的国家博物馆，中央政府的文物管理机构经常把各地一些由考古发掘或民间征集所获的出土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随着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考古院系及各地考古部门同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往来越来越密切，借助考古学方法研究文物藏品的探索也逐渐兴起。多年来，故宫博物院依靠雄厚的文物保护实力和丰富的修复技术，以及对古代藏品的学术研究能力，一直与各地考古机构开展合作，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1950年国立中央博物院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后，考古学家曾昭燏副院长(1956年任院长)曾兼任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主持了南唐二陵等一系列重大考古调查发掘项目。1958年后，上海博物馆组建了考古部，对福泉山、广富林等遗址的发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与其在博物馆建设方面的建树相映生辉。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几经变迁，在1959年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其考古部在山西、河南、江苏等地进行的合作考古发掘项目都取得重大收获，特别是承接了国家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考古的创建任务，更成为我国考古史上的重要节点。

19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兴起，考古任务也随之日趋繁重。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倡导、支持下，一些省市陆续把考古职能从博物馆机构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考古机构。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博物馆与考古的特殊关系：

1. 中国悠久、连绵的历史文化决定了各地综合类博物馆中历史陈列的主角地位。从国家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古代中国”陈列，到各地的文明史、地方史陈列，以考古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建立的时空框架是不可替代的支撑。一些艺术类、专题类博物馆，无论陶瓷、纺织、茶叶、钱币，还是科技史、体育史、戏曲史等方面，但凡藏品涉及古代文物，其资料整理、研究方法甚至藏品来源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成果。

2. 几十年来，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为博物馆提供了大量具有极高科学、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精彩展品，它们已然成为各大博物馆新的镇馆之宝和明星陈列，囊括这些藏品的展览构思，也形成了一批最受欢迎的出国(境)文物展览选题。

3. 考古机构是内设于博物馆里还是另行设立？这一问题涉及到该区域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的历史沿革，博物馆与考古所本身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定位、规模容量，人才的结构、储备与配置，以及当地文物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规划思路等。但是博物馆与考古的特殊关系，始终是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

4. 文物、考古、博物馆，近年又加上文化遗产，这些概念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下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而界限模糊，难于截然区分。从名称上看，有称为《文物保护法》的法律条文，有称为文物局的行政机关，管辖范围既包括考古、博物馆，又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和文化遗产。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既有博物馆(院)，也有考古所(院)，还有些沿用了文物研究所、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工作队等名称。鉴于我国考古与博物馆机构间无所不至的交互渗透、滋养与支



撑关系，这个系统只好使用一个拼接而成的新词“文博”来称谓，诸如所谓文博事业、文博学院、文博图书、文博职称系列等，业内专业刊物名称和范围也是在考古、文物、博物馆、文博、文化遗产等概念的分合取舍之间，寻找自身的主流定位和存在特征。

5. 在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管理部门中，由于国家和地方早年举办过多期文物考古干部培训班，高校中的考古专业又都相对较早成立，在近年高校兴办博物馆专业、文物保护专业之前，具有考古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在业务骨干和管理层中一直是大宗。改革开放以来，一批考古专家走上了各地博物馆、考古所、文物行政机关的领导岗位。19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俞伟超先生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二位先生当年引进的一批考古专业毕业生，今日大都成为博物馆内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近30年，始终在中国考古的前沿耕耘不辍，传道授业，影响深远<sup>①</sup>。例如在他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已经由故宫出版社作为故宫考古所学术著作甲种第一号出版发行<sup>②</sup>。

## 二 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考古学研究

故宫博物院作为博物馆在中国的博物馆里是很特殊的，其馆址所在的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建筑，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官式古建筑最宏大的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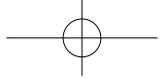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品数量达180余万件，约85%为清宫旧藏。在非清宫旧藏中，有些是通过捐赠、征集得以入藏的出土文物，有些是政府拨交的考古发掘品，其中甚至有河南白沙宋墓考古发掘后拆迁转移的一整座墓的墓砖。在这些早年的发掘品中，少数有明确的出土地点甚至有纪年并已发表了资料，是难得的研究标尺。但很多一直没有被整理发表，其学术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存在着沦为传世文物的危险。

对于以清宫旧藏为主的、数量巨大的、非田野科学考古发掘所得的藏品，用已有的田野科学考古发掘成果，甚至是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来重新检视研究，是对故宫传世文物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对古陶瓷的研究，就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故宫博物院拥有32万余件清宫旧藏陶瓷器，还有3万多件由捐赠、收购所得的精品陶瓷器，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曾入藏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若干陶瓷精品，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北魏青瓷莲花尊、河南濮阳李云墓出土的北齐武平八年(576)白釉绿彩四系罐、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洪武四年(1371)哥窑盘等。但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的主体毕竟是明清宫廷旧藏，最多的还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产品。从宋元明清到民国，历代对古陶瓷的收藏研究颇有历史传承，其途径，

①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赵宾福：《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1日。

② 杨晶主编：《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或著书立说，或口耳相传。故宫博物院延聘的孙瀛洲、耿宝昌等古陶瓷鉴定研究名家，就是当代承袭这一丰厚文化传统的佼佼者。他们熟知历代陶瓷的器形、纹饰、款识、材质和工艺技术，有机会对海量的官民收藏密切接触并上手观察揣摩，再加以悉心查阅朝野著录，乃至亲自尝试各种仿烧技艺，解析、反推当年采用的材料和方法，从而丰富、发展了实物目鉴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体系。

在对大量实物进行归类排比、寻求规律的同时，参照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探索出了宋元明清瓷器断代鉴定的新方法，1950年代开始孙瀛洲先生先后发表了数十篇鉴定、研究文章<sup>1)</sup>，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1980年代以后耿宝昌先生则出版了《明清瓷器鉴定》<sup>2)</sup>一书，至今仍是瓷器鉴定的经典之作与从业的必备教材。

同时，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先生则借助到全国各地进行窑址调查之机，采集标本，确定窑口，校阅文献和其他考古发掘资料，特别注重有纪年古墓葬出土瓷器的采集与整理，开创了一条严谨、系统的陶瓷考古研究之路。

陈万里先生从1928年开始就“八去龙泉、七访绍兴”，对浙江的古窑址进行过现场勘查，为中国古代瓷器研究进入田野与窑址之始。根据调查所得资料，陈先生出版了《瓷器与浙江》、《中国青瓷史略》等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瓷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1950年代起，在陈万里先生的指引下，冯先铭、叶喆民、李辉柄等故宫学者确定了以文献为主线查找窑址所在并到实地求证，进而与传世藏品对比的研究方法，先后对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多处古瓷窑址进行考古调查，陆续发表了10篇窑址调查报告<sup>3)</sup>，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研究的主流。陈先生采集了3万余片瓷片标本，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窑址标本》系列著录<sup>4)</sup>，时代上起东汉，下至明清，以唐、宋、金、元为大宗。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窑口，现在早已无存，其资料更显得弥足珍贵。在对窑址把握的基础上，参照大量考古新资料，冯先铭先生主编出版了《中国陶瓷史》<sup>5)</sup>和《中国陶瓷》<sup>6)</sup>，后者是国家文物局主持编撰的教材之一。同时故宫博物院还派李知宴等人参加了浙江龙泉东区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耿宝昌先生多年来也一直参与对古窑址发掘现场的指导，包括对水下考古所获的瓷器的鉴定研究。尤其是感于外国人盗捞中国领海内的沉船所载瓷器，冯、耿二位先生大力推动我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创建。故宫博物院2005年在延禧宫举办的“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展览”，可以说是对多

1) 孙瀛洲先生发表的文章可参阅故宫博物院编：《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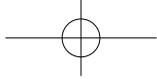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2)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香港两木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该书的上、下两册本曾于1985年由中国文物商店印刷发行，作为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班的教材使用。

3) 参阅《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单独的调查报告主要发表在《文物》上。

4) 故宫博物院编：《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上、下）》（2005年、2013年）、《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北卷）》（2011、2013年）、《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山西、甘肃、内蒙古卷）》（2013年）、《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北京、山东、陕西、宁夏、辽宁卷）》（2013年），紫禁城出版社。

5)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

6)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年来陶瓷考古调查的系统总结与展示<sup>41</sup>。

更直接的考古研究是参与古窑址科学考古发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因为是考古专业毕业，具有田野考古发掘领队资格，参与了多次与当地考古所合作的古窑址发掘工作，如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sup>42</sup>、景德镇丽阳乡元明瓷窑遗址<sup>43</sup>、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和浙江省德清县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sup>44</sup>等。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使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能够及时保持对一线最新资料的跟踪<sup>45</sup>，加强了对考古学术动态的了解，同时也促使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开始思考古陶瓷考古的局限性并致力于加强方法论的建设<sup>46</sup>。

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检测研究中心通过对各地窑址考古出土瓷片和院藏同类瓷器的检测对比分析，建立和丰富了中国古代陶瓷数据库。尤其是其中对宋代官窑和明清御窑瓷器的化验分析，及将馆藏品与窑址出土标本进行对比研究方面，彰显出本院陶瓷科技具有着的先天优势，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sup>47</sup>。可以说，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由于一直注重传统经验积累与现代考古发掘的结合，始终稳立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再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玉器3万余件，主要来自清宫收藏的历代古玉和明清宫廷制作的玉器。其中有些是起初无法被准确辨识的早期玉器，凭借近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可以确认其分别属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甚至还发现有的良渚文化玉琮被清宫造办处加工改造，镌刻了乾隆题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少量玉器发掘品，如安徽长丰县战国墓出土的玉器精品。后来入藏的一百余件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出土的玉石器，因为是经过正规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在玉器研究的著作中除文献考据外，引证了大量考古发掘资料<sup>48</sup>。杨晶研究馆员也一直从事考古学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由于具有考古专业背景和考古发掘领队资格，所以在玉器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排比，运用发掘资料中考古层位学判断年代关系，还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理论辨识不同脉络器物传承交流关系，都能够得心应手，在前

41 冯小琦：《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展览(1)》，《收藏家》2005年第8期，《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展览(2)》，《收藏家》2005年第12期，《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展览(3)》，《收藏家》2006年第1期。

4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43 故宫博物院等：《江西景德镇丽阳碓臼山元代窑址发掘简报》、《江西景德镇丽阳瓷器山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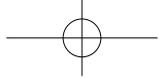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4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45 王光尧：《再论御器厂的建立时间——明代御窑遗址的考古学期》，《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46 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

47 李合，徐巍，李卫东，梁国立，苗建民：《EDXRF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的无损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5期；李合，丁银忠等：《杭州南宋遗址出土官窑类瓷片的科技研究》，《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48 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



人成就中另辟蹊径<sup>1</sup>”。在张忠培先生倡导下，故宫博物院于2011年底与良渚博物院合作共同举办了“玉魂国魄——凌家滩玉器精品展”，反映了博物院对新石器时代玉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sup>2</sup>。

故宫博物院器物类藏品中与考古密切相关的还有很多，除了上述的瓷器、玉器外，还有大家熟知的青铜器。另外雕塑类中也有不少出土文物精品，如陶俑，故宫博物院馆藏有陶俑4000余件，自战国至明清几无间断，涉及地域和题材广泛。如1951年出土的河南辉县百泉东汉墓地动物俑、1955年出土的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天宝四年(745)雷府君宋氏墓陶俑群、1950年出土的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升元七年(943)李昇钦陵墓陶俑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石造像群的一整批藏品更是一直被作为考古专题研究对象<sup>3</sup>。藏品中铭刻类的有刻石，包括石鼓、经幢、画像石(砖)、黄肠石、井栏、石棺、墓志、玺印、封泥等。另外还有出土的战国、汉代漆器、玻璃器。可以说，若利用故宫所藏历代考古文物策划一个中国古代工艺品专题展览，想必会是很精彩的。故宫博物院从唐兰先生等前辈学者<sup>4</sup>到现在的学者杜迺松、刘雨、王素诸先生对于院藏相关文物的研究，也都有充分利用已有考古成果的范例，不再一一赘述<sup>5</sup>。

至于利用考古成果对古代绘画藏品中建筑、家具、器物、服饰等的断代和分析研究，故宫学人也不乏范例。例如余辉研究馆员多年来致力于书画鉴定与研究，特别是利用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一套鉴定早期绘画的基本方法并使之理论化，用逻辑推理的手段解析古画中的图像，探知画史真相，在业内一直受到较高评价。傅东光研究馆员也作过这方面的研究探索<sup>6</sup>。2011年，在故宫博物院以古代书画藏品为主轴策划的“兰亭大展”中，为使观众领略王羲之《兰亭序》中“永和九年”的时代感，特别是对“曲水流觞”中的“觞”有形象、直观的认识，故宫博物院策展人特地借展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考古发掘中M3(雷陔墓)所出土的两件漆耳杯(羽觞)，发掘简报显示，在该墓随葬的一件木方上见有“永和八年七月……”墨书纪年<sup>7</sup>。

宗教类，特别是涉及藏传佛教的建筑和藏品，在故宫文物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罗文华等故宫学者多年来与四川、青海、西藏、甘肃等地考古机构合作，对当地的寺庙、壁画、唐卡、摩崖、造像、古道等采用当前标准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和设备进行调查与记录，使宗教文物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

〈1〉 杨晶：《一件刻纹玉器的辨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杨晶：《中华梳篦六千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2〉 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3〉 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6期。

〈4〉 李刚：《唐兰的青铜器及铭文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5〉 杜迺松：《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王素：《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6〉 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定方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傅东光：《考古学方法、考古出土品与古书画鉴定方法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兰亭展事纪实》，故宫出版社，2012年。



平。此外，在考古调查中还发现，大、小金川的实地场景与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绘画《平定两金川战图册》山形水系高度吻合，再加以出土遗物、地方史志相佐证，有助于判断金川战役的进军路线。2013年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院合作的“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考古调查”项目，发现了3处早期吐蕃石刻群遗存，总计石刻18幅，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青藏高原早期佛教本土化造像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被列入了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sup>1</sup>。

再回到故宫博物院最大的典藏——紫禁城本身，古建筑研究既是建筑学的一部分，也是考古学的一部分。一般所说的狭义建筑考古学，主要是针对那些地面建筑已不存的地下建筑基础和出土建筑构件的发掘与研究等。紫禁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学者们自然对地上的紫禁城建筑研究着力最多。但是紫禁城建成近600年来，虽然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内部各种宫殿、房屋、院落、围墙、道路、集水排水系统等的局部的废弃、重建、改建、迁移等从未停止。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专家长期关注相关问题，结合紫禁城内的工程动土，对揭露的房屋基础和设施及时按照建筑与考古的要求测绘、拍照，留取了宝贵的资料并进行了相关研究<sup>2</sup>。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因为要在紫禁城内西河沿区域修建文物保护中心，按规定程序报请事先进行考古发掘。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的该次发掘是紫禁城内第一次按照现代田野考古要求正式布置探方，结果表明这一区域没有重要建筑遗迹，曾经有过辅助功能的建筑在清道光时期已经塌毁。个别水井、下水道等保存尚好的遗存，将在建设时进行相关规划，以利于长期保护与日后展示<sup>3</sup>。

### 三 故宫考古所的学术方向

在讨论了博物馆与考古学密不可分，对故宫文物藏品研究中考古学手段是不可或缺的途径这两个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故宫博物院考古机构的学术方向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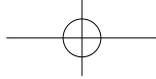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近年来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据国家文物局网站公布，截止2014年7月，全国具有田野考古发掘资质的考古机构有73家，仅在京的就有8家。故宫博物院考古所作为老院新所，大院小所，如何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准确定位问题首当其冲。

故宫博物院考古所的学术宗旨可概括为：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特点的宏观课题下，

〈1〉 《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文物》2005年第2期；《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第二辑；《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考察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罗文华主编，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著：《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壁画》，故宫出版社，2012年；《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2〉 白丽娟、王景福：《故宫建筑基础的调查研究》，《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故宫西河沿遗址》，《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致力于与皇权、宫廷相关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包括古陶瓷、青铜器、玉器、宫廷建筑、美术、宗教文物等已经具有一定优势的课题研究。同时，探索在研究院模式下的机制创新，充分利用院内多部门多学科协作，以及与海内外诸多学术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优势，并且充分发挥与高校协同培养人才的优势。

### （一）紫禁城考古

关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范围，在各大学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中，过去多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宋辽金元。现在也有将下限延伸一些的，把宋元明考古作为压轴。但是在紫禁城，至少有必要延伸到清末民初。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紫禁城，近600年间在7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虽然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局部的动态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很多变迁沿革，特别是地下基础、集水排水等系统的详细状况，由于传统文献资料并不注重且不能精确记载，都是研究者、保护者未曾掌握的。另一方面，作为维护世界遗产的日常工作，在最小干预原则下，在紫禁城内给水、排水、供电、供暖、安防等基础设施的维修、抢险、改造工程中，破土施工每年都是不可避免的。依法且可行的做法是：由专业考古机构全程监测、勘察，实施必要的考古发掘，其结论经专家论证后提出保护意见报批，或将遗址原址保存而工程改道施工，或记录资料后允许继续施工。

仅在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刚刚成立的2013年，紫禁城内就报批获准了3个配合工程考古发掘项目。所发现的重要遗迹包括(1)东城墙墙基，墙内散水、排水系统，以及墙下土、砖相叠的夯土基础。(2)南大库库房外原始铺砖地面、瓷片堆积坑，以及出土重要遗物的灰坑。(3)慈宁花园东排水系统、铺砖地面，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基址以下土、砖相叠的夯土基础和衬石枋承托的砖砌基础。其中南大库遗址出土了大量地层、年代明确的御窑瓷器、玉石器、骨蚌器以及玉石、水晶原料、嘎巴拉碗残片等。在科学发掘与全面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对遗址中各类建筑材料的采样、检测，为研究紫禁城建筑群的分期、各时期的建筑布局、建筑工艺传承与制度沿革提供了一手的科学材料；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初步整理与科技检测，为研究清宫内务府手工业生产情况，以及御用瓷器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嘎巴拉碗的发现，不仅在藏传佛教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研究宫廷宗教和法器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sup>〔1〕</sup>。

针对像慈宁花园以东这类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宫殿基址，我们正在考虑今后的保护与展示方案。就如同大家熟悉的法国卢浮宫，在17世纪路易十四开始大规模兴建的宫殿的下层，观众可以参观经过考古保留的始建于1204年的菲利普·奥古斯特二世城堡遗址。

我们要把紫禁城考古作为大型综合课题，以北京古代都城的城市考古作为宏观的背景参照系统，在逐年院内工程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基础上，探索如何建立相应的工作程序、科研路径和保护方案。通过对个别地点发掘、记录、研究的积累，逐步拼缀、完善紫禁城地下文化遗存分布地图，进而

〔1〕 《紫禁城内的考古发现——故宫明清建筑遗址2014年的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9日。



解读其格局、结构和关联，为重构紫禁城建筑历史提供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 （二）相关皇家遗存考古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皇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必然辐射到全国很多重要城市。例如大型宫廷建筑遗址，除了京城著名的圆明园等遗址，还有各地的皇家行宫、苑囿、陵寝、作坊等。针对上述建筑遗存不乏大量相关的研究课题，和足以互证、互补的资料。又如，紫禁城作为曾经垄断性的官窑瓷器的使用者，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作的明清官窑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实质上是从官式手工业的生产端到使用端的联系，故其在学术研究中互相启迪、互相阐释的例证更比比皆是。再如，故宫博物院与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丹江口市合作发掘的琉璃窑址，是明永乐年间与北京紫禁城几乎同时营建的皇家武当山道观工程的一部分，对紫禁城始建时期琉璃构件烧造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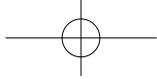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 （三）与各省市区域合作考古

明清紫禁城代表着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发展的最后辉煌，只有寻根溯源，才能真正厘清脉络，理顺传承，解析交流与变革。故宫考古所在自身能力所及和传承工作渊源的基础上，不断参与各地处于中国文明发展不同时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例如王睿研究馆员参与过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的在淇河下游地区的考古调查和鹤壁大赟店遗址、王庄墓地的考古发掘，有助于了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这一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关键时期的区域样本。今后还可能向河北省拓展这一课题，徐海峰研究馆员过去在太行山东麓作过长期、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继续参与完成过去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在胶东秦汉祭祀遗址合作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与出版工作，有助于对中国秦汉直到明清的古代皇家祭祀体制复杂沿袭变革过程的解读<sup>〔1〕</sup>。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和其他一些省市考古机构的合作也一直在探讨中，包括京畿、黄淮、江淮、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及川藏甘青等方向。即使是从故宫考古所自身田野工作队伍成长，特别是从对年轻成员的调查、发掘能力培养，以及保持与不断提高业务素质角度考虑，适当参与各地不同时代、不同类型遗址的考古合作也是必要的。

## （四）对外交流合作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当前广受关注的汉唐时期经由西域的丝绸之路，和宋元明时期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之间，故宫博物院陶瓷考古的特长使其在后一方面有更大发挥的可能。故宫博物院有外销瓷研究、进口制瓷原材料研究等的长期积累。在20世纪前

〔1〕 王睿：《周汉时期“八主”祭祀及历史影响》，《纪念国博百年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徐海峰：《河北商周考古历程》，《文物春秋》2000年第12期。



半期，韩槐准先生已致力于收集海外所见中国瓷器，1950年代韩先生回国入职故宫博物院后，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代表人物，并出版了《遗留南洋之中国外销瓷器》<sup>〔1〕</sup>。2013年起王光尧等参加的印度西南沿海克拉拉邦奎隆古港遗址和帕特南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铜钱和瓷片，发现了中国文化在当地的影响痕迹，这些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今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东非地区，都可以将其考虑纳入对外交流合作考古的视野。

### （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考古学研究

继续运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进行整理研究也是故宫考古的重点方向。在考古所涉及的古陶瓷、青铜器、玉器、建筑、古书画、宗教文物等领域，故宫博物院都不乏专家、藏品、文献资料、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求精不求多，做细不贪大，故宫考古所将继续选择合适的课题作为突破口，立足长远，循序渐进。

### （六）多学科协作研究

故宫考古发展的另一优势，是依托故宫博物院内诸多不同专业雄厚、成熟的力量和资源，尽可能应用各种先进且适用的学术与技术成果。在院内，古建筑、古文献、文物科技保护、修复、检测、拓印、影像拍摄制作乃至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各部门都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成果迭出、人才济济。在院外，一直有规划、建筑、工程、地质、林业、遥感、勘测、地震和北京史地等专业机构参与故宫考古项目合作，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海内外研究机构和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加盟。

总之，由故宫博物院建立的考古学机构和事业，一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创新的平台，会努力探索在博物馆建制中考古发展研究的路径和机制。反过来，故宫考古所取得的成果，也会通过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展览、讲坛讲座、学术研讨会、出版物、多媒体、网络、电讯以及观众教育活动等形式，得到更广泛、更精彩地阐释与传播，让更多的人参与和分享。期待再过10年，当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时，随着故宫博物院年轻一代考古人的成长，故宫考古会呈现出更强更高的生机、活力与价值。

2015年3月

后记：本文撰写中，得到本院、本所各位先生和同仁的指导帮助，吸纳了有关修改补充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韩槐准：《遗留南洋之中国外销瓷器》，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